

OPEN@思想文丛/此岸系列

说话人及其话语

孙先科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OPEN  思想文丛/此岸系列

说话人及其话语

孙先科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说话人及其话语/孙先科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5321-3615-5

I. 说… II. 孙… III. ①话语语言学-研究

②当代文学-文学语言-文学研究-中国

IV. H0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4113 号

责任编辑: 吕 晨

特约编辑: 张 洁

封面设计: 王志伟

说话人及其话语

孙先科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23 插页 2 字数 288,000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615-5/I · 2764 定价: 3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目 录

绪论 说话人及其话语	1
第一章 “革命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及其“成长”	21
一、知识分子形象：“神话家族”中的“中间人”	21
二、政治化与神圣化：“成长”的新向度	24
三、“个人无意识”及其“碎片化”的存在方式	30
结语	41
第二章 爱情·道德·政治	43
一、“题材突破”与“深度模式”的转换	43
二、“三角恋爱”框架与“道德试错”模式	46
三、“以爱情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	51
四、第一人称叙述与“超叙事结构”	58
结语	65
第三章 《青春之歌》的“重述”与江华形象的演变	67
一、身体/政治的诗学与“潜文本”：江华在其中的位置	69
二、修改：对叙事“裂隙”的弥补和对意义的整合	74
三、续集：“潜文本”的显性化和对江华形象的改叙	80
结语	84

第四章 作家的“主体间性”与小说创作中的“间性形象”……	86
一、“主体间性”与“间性形象”……	86
二、小飞蛾:在宏大叙事与民间传统之间 ……	90
三、是谁杀死了李佩钟 ……	96
结语 ……	101
第五章 《三家巷》:一个复杂的话语场 ……	103
一、“革命历史小说”还是“家族姻亲故事”? ……	104
二、周炳:“英雄成长”的变体? ……	111
结语 ……	114
第六章 文本的相互指涉及其意义关联 ……	116
一、《白鹿原》与《创业史》的“互文”关系 ……	116
二、白嘉轩与姚士杰 ……	119
三、田小娥与素芳 ……	127
结语 ……	133
第七章 “历史”或“他的故事” ……	134
一、“新历史小说”的命名 ……	134
二、家族史与革命史 ……	135
三、边缘化的修辞策略与历史的感性化 ……	143
结语 ……	153
第八章 当代文学历史话语的叙事策略、历史观与叙事伦理……	154
一、文学叙述历史:一个语言事实 ……	154
二、“革命历史小说”:一种“拟科学”文本……	155
三、“新历史小说”:解构“宏大叙事”……	159
四、图像语言的“空间”化处理:解构历史理性 ……	163

结语	167
第九章 复调性主题与对话性文体	169
一、“初始情境”、经验类型与主题结构范式	169
二、“青春体小说”的“主调”与“副调”	171
三、“考验小说”与“意识流”	175
四、“季节系列”和“杂语”的处所	181
结语	185
第十章 王蒙小说中的“原型”及其意义阐释	187
一、“年轻人”传记系列与“原型”	187
二、“年轻人”的革命起源叙事	192
三、“史前史”的进入:寻根、审父和对“初始情境” 的反思	198
四、三角关系中的主体、助体与介体	203
五、“大义灭亲”的故事:父子之情与国家公义	215
结语	227
第十一章 “年轻人”的精神成长与“父之法”	229
一、“问题小说”抑或“成长小说”	232
二、林震与刘世吾:冲突与对话,审视与自审	235
三、主体想象上的兄/弟关系与代际之间的“三元 结构”	239
结语	244
第十二章 从改造“资产阶级的王国”到建构“中华民族 的脊梁”	246
一、话语裂缝造成的叙事	246

二、“旁观者”的出场	268
三、知识分子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300
结语	319
第十三章 没有彼岸的“真正的生活”	325
一、作为一个文化现象的池莉小说创作	325
二、“新孩子”的“失乐园”:性格的对峙与认知的偏执 ...	327
三、倾斜与失重的“仿真空间”	336
结语	359

绪论

说话人及其话语

—

丹麦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在其理论批评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引言”中,说过一段这样的话:

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小说、戏剧还是历史作品,都是许多人物的描绘,表现了种种感情和思想。感情越是高尚,思想越是崇高、清晰、广阔,人物越是杰出而又富有代表性,这个书的历史价值就越大,它也就越清楚地向我们揭示出某一特定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人们内心的真实状况。

对于那些坚持文学的唯一价值在其“本体”的批评家来说,勃兰兑斯所表达的文学观与文学史观由于过分强调“思想”、“感情”等内容层面的东西,而对“形式”不置一词,因而就显得极其“古典”,甚至因为过时而透出“冬烘”的味道。著者是在二十世

纪八十年代的文学语境中成长的,对当时的“先锋”浪潮并不陌生,对文学研究中的本体论倾向一度非常痴迷。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年岁日增,文学观却渐趋保守,转而对曾经不屑一顾的勃兰兑斯的文学灵魂说日益地钟情起来。在勃兰兑斯看来,文学因其独特的幻想性质,它的“虚构”的、隐喻的特性,从而更加真实地表现了人类的感情与思想。基于此,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

尽管勃兰兑斯认为“种种思想感情”是蕴含在小说、戏剧或者历史作品中的,即“灵魂的历史”是保留在文本中的,但他的批评实践却主要是从思潮的角度展开的,用韦勒克的术语表述,勃兰兑斯主要进行的是“外部研究”。既然“灵魂的历史”蕴藏在文本中,为何不能通过对文本的解读阐释,去直接地触摸“灵魂”呢?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亦可谓波诡云谲,变幻多端,这其中不是也蕴含着当代中国人“灵魂的历史”吗?通过对当代小说的解读能否实现触摸当代中国人“灵魂的历史”的目标呢?

但是,灵魂在哪里?它并不直白地被写在文学文本中,我们能够触及的只有故事、人物、环境以及对这些因素的讲述过程。故事、人物、环境当然都不是无情物,都言说着某种“意义”,但这种意义只是阐释学家所说的文本意义的“第二层”,而更深的意蕴,我们可称之为“灵魂”的东西,恰恰隐藏在复杂的,甚至是相互纠缠、矛盾的话语背后,通过什么样的阐释方式以抵达文本的“灵魂”深处,就是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传统的社会学批评在文本与现实世界之间建立起一种关联,它以真实性作为衡量文学文本价值的标准,在它的视域中是很难找到达至文本灵魂的触角

的。典型化的批评观是以人物阐释为中心的,但是典型化批评是以“人”的社会历史属性为本位的,对人精神深层的、无意识层面的内涵的关照,缺乏足够的有效性。另外,所谓文学作品的“灵魂”,既不纯粹地表现在作家主体那里,也不完全表现在人物、故事等被叙述的客体那里,而是表现在主体与客体的结合中,表现在说话人以及他所说出的复杂的话语中。因此,如何进入一种特殊的话语——文学话语——的话语分析,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步骤。

近些年来,随着小说理论的丰富与增殖和小说批评实践中的批评方法的日益多样化,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之外,精神分析、叙述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新方法的运用拓宽了小说批评的视域和疆界,极大地丰富了小说批评的批评语言。但是,由于这些方法大都从哲学、人类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中“拿来”,而不是建立于对小说这一问题的本体论思考上,因此新方法在使用的过程中难免牵强附会、捉襟见肘。相比之下,巴赫金所提出的“语言形象”及所衍生的相关批评概念,对于小说这一文体,对于要达到对文本进行深层话语阐释的企图,或许具有更重要的“诗学”价值和更强大的阐释力。

二

巴赫金把现代小说在本质上看作是一个“杂语”的事实,是不同的语言之间进行的“对话”,他认为“真正的小说作品所要求的前提条件,是语言的内在分野,是语言中社会性的杂语现象,还有

其中独特的多声现象”^①。基于此,他为现代的小说修辞研究确定的基本任务与特点是研究“主题的对话化”,而主题“可分解为社会杂语的涓涓细流”、“通过不同语言和话语得以展开”^②。基于同样的原因,他既反对将小说看作非艺术性体裁,比如将小说与雄辩术等同起来;同时也坚决反对将其与诗歌等量齐观。因为在他看来,诗歌因“满足于一种语言和一个语言意识”而缺乏对话性^③。从这种本质性的语言观出发,巴赫金将小说这种体裁的核心课题概括为:“如何对语言进行艺术描绘的问题,语言的形象问题”,“其特征不是人自身的形象,而是语言的形象。可是,语言要成为艺术形象,必须要与说话人的形象结合,成为说话人嘴里的话语”。^④

正是由于巴赫金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将现代小说看作是不同语言之间的对话,而不是仅仅将小说看作是表达作者观念的一种载体、一种采用了艺术形式的“独白”,因此,他的批评语汇中的最基本单位不是主人公——作品所描绘的人物形象,而是“说话人”。这二者的区别在于,说话人既可以是作品的主人公,也可以不是主人公或其他人物形象,而是作者,或者说是“隐含作者”;并不是所有的主人公都是“说话人”,关键看他是否说出了自己的话语,并与其他话语构成了对话关系。对这种“说话人”和他的话语,巴赫金做出了三点明确的规定:

①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第4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同上,第41页。

③ 同上,第66页。

④ 同上,第122—123页。

(一)说话人及其话语在小说中也是语言的及艺术的表现对象。说话人的语言在小说中不是简单地传达出来和复制出来,而恰是艺术地描绘出来;并且和剧本不同,又是靠语言(作者的语言)描绘的。不过,说话人及其话语作为语言的表现对象,应算是一种特殊的对象,因为用语言来表现话语,不同于表现其他的对象(如不能说话的事物、现象、事件等),为此讲话和语言描绘要采用完全特殊的形式手法。

(二)小说中的说话人,是具有重要的社会性的人,是历史的具体而确定的人,他的话语也是社会性的语言(即使在萌芽状态),不是“个人独特”的语言。对小说来说,个人独特的性格、个人独特的命运,以及完全取决于他们的个人话语,本身是无足轻重的。主人公话语的特点,总是希图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具有社会的广泛性;这是一些潜在的语言。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主人公话语才能成为分化语言、带进杂语的一个因素。

(三)小说中的说话人,或多或少总是个思想家;他的话语总是思想的载体。一种特别的小说语言,总意味着一种特别的观察世界的视角,希冀获得社会意义的视角。正因为是思想的载体,话语在小说中才能成为描绘的对象;也正因为此,毫不担心小说会沦为空洞无物的文字游戏。^①

①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第11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巴赫金对“说话人”及其话语的论述或许并不是完全成熟的,会引起各种各样的争论,其论点也有待进一步的论证、深化,使其更严密、更完整、更体系化。但是,从已有论述的基本面貌来看,其理论的独特性和原创性已经初步显露出来。若做简略的归理,著者以为可有三点:(一)以说话人及其话语作为小说叙事的基本结构单位和意义单位,改变了只将主人公作为叙事的结构与意义核心、主人公仅是作者的“第二个自我”、在全面的意义上代替作者、是作者传声筒的美学观和阐释理念。说话人可以是主人公,也可以不是;可以是作者,也可以是更为隐蔽的“隐含作者”;主人公与作者完全可以并可能在不同的思想层面上进行“对话”(思想、观念、意识不同甚至对立)。“说话人”的关键标示是,作为“语言”的主体,拥有自己独特的发言立场和话语方式,并在平等的立场上与其他语言主体进行对话。(二)小说中的说话人是具有重要社会性的人,“或多或少总是个思想家”。这里,巴赫金特别强调了说话人的“社会性”与“思想性”,并说:“个人独特的性格、个人独特的命运,以及完全取决于他们的个人话语,本身是无足轻重的。”这种表述似乎给人一种轻艺术、重思想与理念的极端印象。事实上,巴赫金真正想强调的是,说话人作为一种语言主体,一定要体现这一主体具有的历史性,他的社会性的“成长”以及这种“成长”所具有的社会意义,而不应该使说话人成为“为个性而个性的”的“恶劣的个性化”的个人。^①(三)说话人及其话语

^① 恩格斯:《恩格斯致斐·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4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应该被“艺术地描绘出来”而不是“简单地传达出来和复制出来”,使其成为独特的“语言形象”,它是思想的载体,而不是思想本身。

综合观之,巴赫金尤其突出了“语言形象”作为思想史踪迹的重要意义。但是,如果认为巴赫金轻视了对小说人物的性格分析、文体分析和美学分析,或者认为他干脆置“艺术”于不顾,那将是一个巨大的误解,巴赫金小说理论的革命性与创新性恰恰在于,他认为“语言形象”——说话人及其话语,是构成小说这一重要文体修辞特色的基本对象和基本单位,是小说的结构性因素,而其功能和意义因素就是“思想”,思想与艺术在巴赫金的小说话语中是二而一的存在物,无法分割,无法析离。或者说,对小说修辞特色的分析,就是对说话人及其话语的话语分析,是艺术分析,同时也是思想分析。反过来,对小说的思想分析,又是对小说的修辞分析和对主人公及其话语的话语分析,也即对小说的艺术分析。

三

以“语言形象”作为核心分析范畴——以“说话人”而不是以人物性格作为批评对象与分析单位、以“说话人”的话语而不是以“艺术形式”作为阐释目标,其意义不仅仅是遣词造句或命名的区别,更重要的是,这种命名背后所隐含的批评范式的转换,以及由此所延伸出来的批评范畴、阐释思路和阐释目标的巨大分野。

说话人作为“具有重要的社会性的人”和“思想家”,对他的

分析和阐释主要不是围绕“性格”而展开的,像在“典型性”批评话语中所作的那样,取而代之的是对“说话人”,即作者或“隐含作者”、主人公或其他人物形象、叙述人或视点人物等所有在文本中具有言说主体地位的角色语言意识形成过程的分析,又是对说话人作为一个语言主体其“主体性”的“成长”过程的分析,而个人独特的性格、个人独特的命运反而变成次要的事实,或者像巴赫金所说“是无足轻重的”。在这里,主体及其“成长”取代性格、典型而成为对小说进行阐释和分析的核心范畴。

主体及其“成长”与性格和典型显然是隶属于不同批评范式中的概念,它们赖以提出的语境、所关涉的论域、突出的问题意识是不同的。或者说,两个美学范畴均建基于思想史背景中的主体论,但主体性的内涵却存在着鲜明的分野。

性格论或者说典型观念形成的思想史背景是理性主义,是现代的主体观(它在哲学、法理、美学诸层面上和后现代“主体”成长所仰赖的语境是不同的)。在哲学上,尽管存在着英国经验理性主义和法国先验理性主义的不同,但理性主义共同认为人是“我思”的主体,是意识的主体,具有可靠的思维能力,可以获得可靠的关于世界的知识,当然也包括关于人的知识,就是说人同时可以将自己作为认识对象进行把握和认知。在法理上,尽管存在像洛克、伏尔泰等人强调个人具有不可让渡的权利和霍布斯、卢梭等人强调社会契约、强调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之间的不同,但在一个基本点上他们是相同的,即认为个人与社会、个体与整体是不可通约的,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个人与整体的关系成为法律和政治学说思考的核心。正是基于这种人是可靠的、意识是可

靠的,人可以把握世界,也可以被把握被分析,个人具有意志的自由,但自由意志是在与社会的“交换”关系中实现的理性主义的哲学观,因此就成就了以认识论和辩证法为基础的现实主义的美学观,黑格尔的“这一个”和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化”观念是这种现实主义美学观的核心范畴。

性格论和典型化批评范式所涉及的论域主要在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哲学等“外部的”属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其突出的问题意识是社会批判意识,即在个人/社会、个体/整体的结构性框架中,通过叙述个人的受损或者毁灭,展开对社会的批判。革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将这一结构进行翻转,通过宣判个人主义与个性主义的不合法与失败,预言、宣告社会与政治“乌托邦”的光明前景,社会批判意识被改造为个人批判意识。无论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个人本位的社会批判意识,还是革命现实主义的社会与集体本位的个人批判意识,两者均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意识。这种强烈的政治意识既表现为鲜明的非此即彼的思想倾向性,也表现为其修辞风格上的强烈对比与叙事上的巨大张力,诸如人物阵营的二元对立、非黑即白、非善即恶,伦理意识与政治意识高度的一致性,修辞符码政治化、道德化等。

二十世纪后现代主义的哲学与文化思潮对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的主体观进行了强劲的反思与改造,“主体”获得了新的阐释、新的内涵。

一位研究福柯主体论哲学的学者说: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简单地把存在当作一个事实(“我思”),把存在的个别主体(“我”)和意识(“我思”)等同起来,这种理性主义认识论忽视了

无意识现象(梦和癫狂)、共同体现象(语言)和变动不居的存在状况(历史经验)。因此,反笛卡尔主义是福柯的理性批判精神的理论基础和反人类学主体的生长点。^①另一位研究精神分析批评的学者在评述拉康的“主体”概念时说:

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自我”不再是一个核心概念,取而代之的是他所称的“主体”,即意识和无意识活动的整个机制,它由意识的、可知的心理与无意识、不可知的“它者”构成。……由此看来,主体不再是一种自我而是一种符号建构,一种“语法化的”结构。这样,主体以符号建构为媒介,不仅打通主体与文化的通道,而且与其他主体相联结,从而使主体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人。^②

阿尔都塞则提出了“想象主体”的概念,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揭示了主体的生成过程。在他看来,人处于各种关系的制约当中,并没有统一的主体性。但是这并不是每个个体想象、体验自己的方式,每个个体倾向于将自己想象为自由而自为的主体。而促使他们这样想象、这样思考的动力与影响因素就是“意识形态”。与国家机器采用暴力的方式对个体进行强制和监管不同,意识形态,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以客观的、中立的方式进行“教化”。这当然是一种假象。在这一点上,伊格尔顿表述得更加清楚:

① 莫伟民:《主体的命运》第68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② 方成:《精神分析与后现代批评话语》第50—5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